

高 风 可 风



中山大学教授周春健： 接续尺牍传统， 对于新时代的青年学子是历史使命

“高风可风——习之堂藏现代学人信札特展”日前在中山大学锡昌堂举办，主要展出习之堂藏民国以来文化教育界学人之间的往复通信60余通。“高风”既指深厚的情谊，也含有崇高的德行的意思。

信札，旧称尺牍，是古来交流信息、表达情谊的重要方式。书为心画，言为心声，故素有“且凭尺牍寄长怀”之语。古时云“家书抵万金”，信息传递成本高昂，寥寥尺牍，便被世人视若珍宝。而今科技昌明，信息流转近乎唾手可得；文字往来之间，无论书写表达，抑或仪轨范式，典雅气韵多已消散，人与人之间反而生出重重隔膜。

对此，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周春健表示，尺牍传统代表的是中华文明传统，士人襟怀代表的则是学以成人路径。接续尺牍传统对于新时代的青年学子而言，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历史使命。

人物介绍



周春健

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习之堂儒学馆创办人。

2 张林川先生的回信 在我的古典文献学研究中 起到奠基作用

收藏周刊：品读信札过程，是否曾经对您在学术研究上，有过特别启发？

周春健：这里可提及四通书信，都是学界前辈给我本人的回信。一是1995—1996年间为报考古典文献学研究生，我曾多次给湖北大学古籍所张林川先生(1952—2004)写信，张先生均耐心回复。犹记得1995年9月22日第一次收到先生复信，信中对古典文献学这一学科作出介绍，并从未来发展角度提出殷切期望：“我们很希望有人能在继承好传统的同时，为这门学科的发展走出新路子”，颇能够体会到先生的良苦用心。古典文献学作为本人多年来的主要研究方向及方法，这通信札堪称起了奠基作用。

另一封是1999年12月9日收到山东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专家董治安先生(1934—2012)回信，先生随信奉寄《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》一书，为我写作硕士毕业论文《左传引诗考析》提供了很大帮助。还有的是分别于2002年6月15日和2009年3月16日收到复旦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的两通书信，第一通提及他真正关心的是年届迟暮，“能否真为学界留下几颗读书种子”，体现出先生在培养后进上的忧患；第二通则对中国学术史的近代研究范式提出批评，并指出“宋明所谓陆王，明清所谓西学，在学术史上如何估量，可能更需要关注”，这对我本人的中国学术史研究起到了莫大的方向性指导作用。

3 手写的过程 也是一个静心 and 修养的过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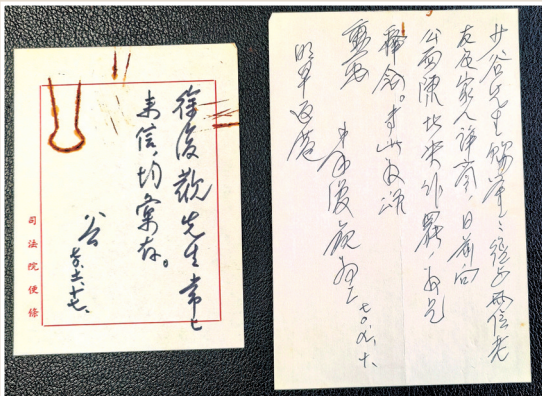
收藏周刊：书信在您的日常中占据怎样的地位？您是否也会时常跟名家有书信方式的往来？

周春健：手写书信是电脑和智能手机普及之前最主要的沟通方式，差不多在2000年之后，人们逐渐以电脑写作取代了传统书写方式。因我本人喜欢书法，所以多年来还一直保持着手写书信的习惯，不过近些年来也主要是通过邮件与师长友朋联络。偶有例外，比如语文出版社冯瑞生先生是著名辞书学专家，他依然习惯手写。前几年因为与冯先生讨论《随笔》投稿事宜，我们之间往复书信十数通，我都小心珍藏。手写的过程，也是一个静心和修养的过程。

收藏周刊：在新一届新生入学之际，推出信札展，是不是具有特别的意义？

周春健：这一次展览的名称定为“高风可风——习之堂藏现代学人信札特展”，主要展出习之堂藏民国以来文化教育界学人之间的往复通信60余通。“高风”一词其实包含两层含义：一是深厚的情谊，二是崇高的德行。

展览对外开放之后，我曾经发过一条朋友圈，标题是“接续尺牍传统，追慕士人襟怀”。尺牍传统代表的是中华文明传统，士人襟怀代表的则是学以成人路径。这对于新时代的青年学子而言，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历史使命。



■徐复观信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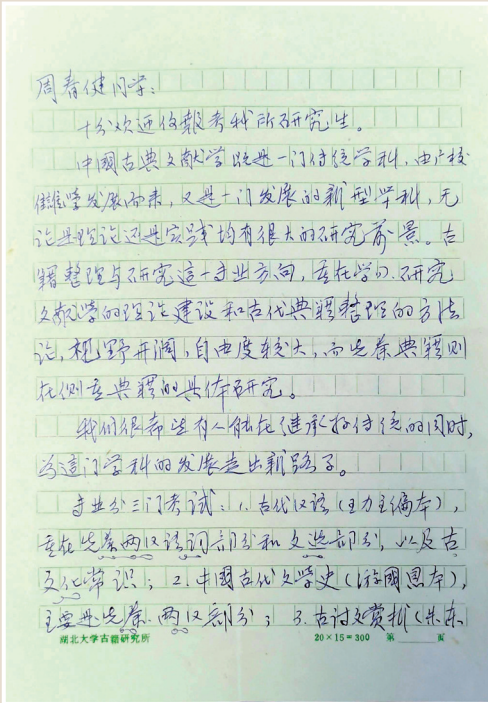
1 书写之自然 语言之典雅，程式之规范

收藏周刊：您能否总结概括这批信札的主要特点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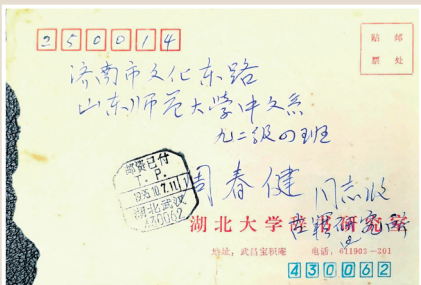
周春健：这批信札的特点，一在尺牍形式。尺牍是古来交流信息、表达情谊的重要方式，一方面有其重要实用功能，乃传统社会应酬交际必需之要品。无论政学军警商业贸易，抑或庆贺慰藉荐举叙约，无不通过信札尺牍联络沟通；一方面又具有突出的文化特质，大端有三：一在书写之自然，二在语言之典雅，三在程式之规范。传统尺牍之抬头落款、敬语谦词，本身即为中华文明之重要体现。此次展览虽然展出的多为现代学人信札，但从无论从气质品格还是从格式规范，都是旧有尺牍传统的延续。此次展览的另一个特点，在于信札书写者是“学人”身份。学人之间的通信，往往讨论学问、争鸣思想，因此摩挲诸品，既可见诸贤达对学问之谨严敬畏，又可见朋友间直谅多闻同声之谊，更可见传统士人之胸怀襟抱气度风范。云笺雁字，诚文化之缩影，文明之载承。

收藏周刊：展出的信札中，特别需要一提的有哪些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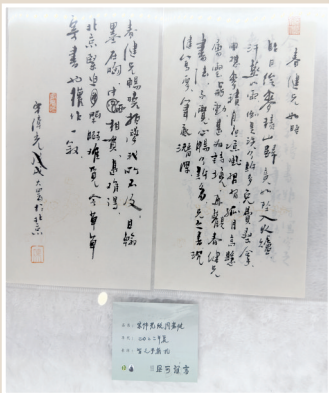
周春健：习之堂留意收藏学人信札数百通，其中不乏缪钺致沈善钧、周勋初致程千帆、王运熙致吴文治、赖少其致蔡迪生、翁子光致温丹铭等名家手笔。这些学人信札往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，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通。一通是1981年9月10日徐复观先生(1904—1982)的一通信札。书信内容虽然简略，但因徐复观先生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，故而信中所提到的人物与事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。我曾就信札的释读及相关背景请教徐复观研究专家黎汉基兄，汉基兄专门查询徐复观日记作出解读，信札内容豁然开朗，此通信札亦可视为研究徐复观先生的重要文献。另一通是1984年11月6日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(1927—2014)致邢益海兄信札，益海兄当时是中山大学哲学系在读学生，准备报考汤先生的研究生。汤先生回信中不但对益海兄的论文作出指导，而且提及当时在深圳大学设立了“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”(即今日深圳大学国学院)，认为未来若到深圳大学工作，“也许更有发展前途，因为思想可以更开阔些”。这通书信出自著名学者手笔，反映出上世纪八十年代“国学热”的文化背景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南方文化的重要特色，殊有历史认识价值。



■张林川致周春健信。



■张林川致周春健信(封)。



■宋伟光致周春健信。



■展览现场呈现的信札。